

跨界民族的学术史扫描:概念、分类和研究内容

刘涛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以“边政学”为研究核心,到今天学者以“跨界民族”为研究内容,概念和研究重点都有很大变化。本文对跨界民族进行全方位的学术回顾,具体从概念、分类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希望从中能发现前辈关于跨界民族研究的得失和跨界民族研究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跨界民族;学术史回顾

中图分类号: C 9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2X(2012)05-0012-05

对于跨界民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民国初期。当时,一些外国人开始对中国的跨界民族开展了研究,但成果不是很多,中国学者到边疆地区进行田野工作者寥寥无几^{①(P21-22)},学界也没有提出“跨界民族”的概念。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以“边政学”为研究核心,对“边疆民族”、“边疆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凌纯生的《中国边疆民族》、《中国边疆文化》;芮逸夫的《中国民族与越南民族》、《缅甸民族》;凌纯生和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周光倬的《滇缅边境之种族界线》;陈序经的《暹罗与中国》。在此期间,学者主要研究的关注点放在“边政学”,并且对所调查对象的社会文化进行描述,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作“跨界民族”研究的成果,究其原因还是没有对跨界民族的“跨界性”进行比较研究^{②(P22-23)}。“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发现和描述边疆各民族,但由于当时的研究对象许多是属于现今跨国民族的,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边疆各民族资料,可谓成果显著”^{③(P22)}。

20世纪80年代,“跨界民族”作为民族学中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有很多学者开始对“跨界民族”进行研究。范宏贵在《日益严重的越南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跨国界民族”这一术语。范宏贵在《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依族的古今关系》一文中,最早地使用了“跨境民族”这一术语。范宏贵在《中越两国跨境民族》一文中,在标题中使用了“跨境民族”,之前也没有人在标题中使用“跨境民族”这一术语。在以后的跨界民族研究中,“跨界民族”和“跨境民族”这两个术语

都在著述中出现,并且有学者对其进行概念的界定、分类等多方面的研究,使理论得到深入的探讨。

学界从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去研究“跨界民族”,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另外,从1986年起,中央民族学院招收两届以“跨界民族研究”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十余名,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宋蜀华教授招收了以“民族学中国化与西南跨界民族”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④(P26)}。此后,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招收与“跨界民族”相关的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同时,学界也开展了多次以“跨界民族”为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与会学者进行了多方位的、深入的探讨,从各自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的动态进行了交流,为“跨界民族”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和交流机会。并且,国家社科基金也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经费资助具有高水平的学者进行“跨界民族”的研究。

一、“跨界民族”概念之辨

关于“跨界民族”的概念,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新的分歧出现,尤其关于“跨界民族”的概念界定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20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并广泛使用“跨界民族”和“跨境民族”。到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跨国民族”。虽然三个术语不完全一致,但是涵义上基本相似。另外,其他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跨界人民”、“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无国家民族”等新的术语。“不管它们

收稿日期:2012-02-10

作者简介:刘涛(1982-),男,河南开封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①周建新、黄超:《中国跨国民族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②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哪一个,都是新的术语。在中国的权威工具书,截至到20世纪末,均未有收录这些名词。在国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用法,专门的研究也很不够。西方学术界对此亦未形成统一的术语或表达”^①。

姜永兴对“跨境民族”进行简洁明了的定义:“同一民族分别居住在国境线两侧系称跨境民族”^②。刘稚、申旭认为:“同一民族在国境线两侧相邻而居称跨境民族”^③。金春子、王建民认为,“跨境民族是指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者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所谓‘界’是指国界。”并且他们认为:“近年来,有人也经常在各种场合使用‘跨境民族’一词,境即指国境线,跨境即跨界。不过,在使用中似乎‘界’(Border)较‘境’(Area)更确切些,因为境是指区域,讲‘跨’区域,不如说‘跨’一条边界线更清楚……当然,从实际内涵上来看,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④。朱宁在《中国跨境民族》的序言中写到:“事实上,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的涵义是基本相同的,前者为边界两侧,后者为边境内外,从总的概念来说并无二致。重要的是,不论称之为‘跨界’民族或者‘跨境’民族,其异不在于‘界’或者‘境’。冠以‘跨界’或者‘跨境’,重点是这些民族在分布上的特点,以及与分布于‘内地’民族之间的不同的特点和差别”^⑤。

刘稚认为:“跨界民族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⑥。赵锦元、葛公尚认为:“跨界民族就字面意义而言,跨界民族应当包括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⑦。胡起望认为:“跨境民族就是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长期居住,但又保留了原来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彼此有着同一民族的认同感的民族”,并且认为:“他们虽然长期分居于不同国家,受当地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不同影响,在语言、服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各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在他们传统文化的底层,以及日常生活的深处,与原来的民族传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举例进一步阐明:“汉民族就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跨境民族,他们不仅在中国周边的各国中居住,而且在美洲和欧洲的大

城市中形成了自己小聚居区”。但是,他认为跨境民族与跨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跨界民族是指同一民族在相邻的两国间跨国界而居,他们的地理分布,基本上连成一片,民族居住地区因国界而划分成为两部分,他们是具有不同国籍的同一个民族。跨界民族是跨境民族的一部分。跨境民族是指跨国境而居住的同一民族,他们的地理分布可能并不连成一片,有的从居住的第二国、迁入第三国、第四国,他们不仅可以跨国居住,有的还远渡重洋,成为了跨海洋而居住的民族。跨境民族是一个比跨界民族更宽的概念。跨境民族的一部分是跨界民族,但有的民族因各种原因有了世界性的迁居,他们就不仅是跨界民族,而成为了跨境民族”^⑧。

而曹兴认为要把“跨界民族”的内涵界定清楚后才能更全面理解“跨界民族”:“第一,要把狭义的跨界民族和广义的跨界民族区别开来。狭义的跨界民族,就字面意义而言,是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究其原因,跨界民族是各民族集团之间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渐模糊和国家间的政治界限日益分明交互影响的结果。所以,狭义的跨界民族是民族本身和民族传统聚居地被国家分隔的产物,简言之是国家分隔力的产物。广义的跨界民族既包括被国家分隔、消极被动跨界而居的民族,也包括主动积极移民跨界而居的民族。前者是国家分隔的产物,后者是移民的产物。所以,广义的跨界民族是国家分隔力和民族跨界(移民)的双重产物。把民族的移民现象从跨界民族的范畴中肢解出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只承认狭义的跨界民族,而否认广义的跨界民族,也是不全面的”^⑨。并且指出:“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跨界’,而在于主动和被动的区别,跨界民族是被国家主权政治分割的产物,而跨境民族是民族主动跨境即移民的结果”^⑩。

对于“跨国民族”,马曼丽是这样定义的:“跨国民族是对两国或两国以上(无论是相邻国的两侧的、还是远离边境的)、基本保持原民族认同的、相同渊源的人们共同体的指称”^⑪,并且认为“跨国民族是一个兼有文化与政治内涵的特殊族体”^⑫。石茂明认为:“‘跨国族群’更加妥当,

①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第68-69页。

②姜永兴:《我国南方的跨境民族研究》,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31页。

③刘稚、申旭:《论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76页。

④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⑤朱宁:《中国跨界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⑥刘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91页。

⑦赵锦元、葛公尚:《当今世界的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48页。

⑧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49页。

⑨曹兴:《跨界民族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页。

⑩曹兴:《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39页。

⑪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⑫马曼丽:《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把分布在更宽范围的、不受陆地边疆和居住地连片之限制的同一来源的族裔群体称为“跨国族群”……把“跨国族群”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跨境族群”,或者把“跨界族群”、“跨境族群”理解为狭义的“跨国族群”,并坚持,“跨境族群”和“跨界族群”并无实质性差异”^①。

随着“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在各种学术著作中的广泛引用,也有人对其概念的界定表示质疑。朱伦先生认为:“跨界民族”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应该用“跨界人民”来取代“跨界民族”,“在我国民族研究界及政治生活和社会舆论中,‘跨界民族’似乎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没有人对它产生疑问。但只要深入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跨界民族”说是不能成立的。在理论上,“跨界民族”说有概念不清的错误;在现实生活中,它经不起民族现实状况的检验”,他认为“民族、国家具有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特性的前提下,‘跨界民族’说也就不能成立了”,并认为“跨界人民”和“历史民族”来取代“跨界民族”,“在相邻的人民实现政治统一与地域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些弱小的‘人民’不可避免地或被肢解,或被分化,由此形成了‘跨界人民’。‘跨界人民’不是同一个民族。但从文化和历史方面看,‘跨界人民’又曾是同一个民族。对于这样一种人们共同体,国外有人用‘历史民族’(historical nationality)称之;也有人用‘文化民族’(cultural nation)称之。笔者倾向于用‘历史民族’来界定。所谓‘历史民族’,是指在历史上具有政治统一性或最终未形成统一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而在现实中被分成了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的‘跨界人民’”^②。

关于对概念界定和统一,学术界会继续争论下去。只有大家在认同“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的共通性的前提下,才能继续对跨界民族进行深人的研究。本人认为“跨界民族”的范围相对于“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的范围较小,例如生活在在中越边界上蓝靛瑶族,符合“跨界民族:在相邻两国国界而居的族群”概念。所以,笔者认为用“跨界民族”这一术语来界定“生活在边界两边的同一个族群或民族”较为恰当。

二、“跨界民族”的形成与分类

“跨界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学界基本认同“跨界民族”的形成的两种原因。

一是“原来居住同一地区的同一民族,并非由于迁居,而是由于国界的划定而成为跨境(界)民族”^{③(P51)},换言之,“原来就有这些族群,原来就居住在这个广大的范围内,本无跨界不跨界之说,一划国界,他们就成了跨界族

群”^{④(P79)}。这种情况的例子较多,如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一些跨界民族,瑶族、苗族、汉族、回族、藏族、景颇族、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布依族、京族等等。另外,由于国界的划定而成为跨界民族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鲜半岛的朝鲜族。朝鲜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成立,“三八线”的划定,导致了在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民族分成了属于两个不同国家的同一个民族,成为跨界民族最为典型的个案。

二是“由于民族人口迁居的结果而形成的跨境民族,这在跨境民族中要占绝大多数。这种迁居的原因,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既有被迫的,也有自愿的”^{⑤(P51)},也就是说,“因为人口移动而形成的跨国族群”^{⑥(P79)}。但是人口迁居的原因有出于个别原因,也有多种情况综合出现进行人口移动。如中国南方的跨界民族瑶族,瑶族的先辈是“吃过一山又一山”,这座山的生态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不足时,就迁徙到另外的一座山,在边界的概念没有完全清楚时,瑶族就会迁徙到另外地区的山区,这些地区由于现代国家划定边界后属于不同的国家,就把瑶族分开在不同的国家;也有民族是因为经商而形成的跨界民族,如“中国的乌孜别克族”^{⑦(P51)};也有民族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形成的跨界民族,如“中国的塔塔尔族,有一部分是因经商等从喀山地区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北部居住,但也有一部分是19世纪后半期由于沙俄封建领主的压迫,而越过伏尔加河,来到中国新疆的布尔津、哈巴河等地的”^{⑧(P51)}。

“跨界民族”的分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类。胡起望把“跨界民族”分为四种类型:“A型跨境民族,就是邻国界而居的跨境民族;B型跨境民族是前述跨境民族中的一部分居民,由于各种原因,又从第二国迁入第三国、第四国,他们分居几国,地区并不相连,有的甚至远隔重洋,分居不同的几大洲;C型跨境民族是同一民族分居在若干国家,他们有的在居住国人口中还占有较大比重;D型跨境民族是同一民族分居几国,有的部分在别的国家有了较多的特点,尽管他们与原来的民族出于同一族源,在语言、文化上有一定的共通点,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民族名称(主要是他称、自称一般相同),由于各国划分民族的标准和理解不一,被看作不同的民族”^{⑨(P51)}。

刘稚对“跨界民族”的分类,是根据其在相关国家的人口比重和地理分布情况,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1. 在相关各国均为主体民族的跨界民族,此类跨界民族是指原来具有共同地域的同一民族后来被国家疆界分隔,虽然分属于不同国家,但在相关各国都是主体民族或多数

①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72-73页。

②朱伦:《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12-16页。

③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

民族,如东西德的统一;2. 在相关各国主体与非主体并存的跨界民族,是指分属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在某个或某些国家是主体民族,在其他国家是非主体民族的跨界民族,如西欧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北爱尔兰人;3. 在相关各国均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此类跨界民族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国家都不是主体民族的同一民族群体,如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壮、傣、苗、瑶、哈尼、景颇、拉祜、傈僳、佤、德昂等10余个跨界民族均属这一类型的跨界民族^①。

石茂明根据不同分类方法对“跨界民族”进行分类:“第一,从跨界族群(跨界民族)的形成来说,可以分为‘迁徙形成的跨界族群’和‘边界确定形成的跨界族群’;第二,根据跨界族群所跨国家数可分为‘双边跨界族群(Bilateral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多边跨界族群(Multilateral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第三,根据族群与国家关系,可以分为‘有母国的跨国族群’和‘无母国的跨国族群’;第四,‘少数民族’是民族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角度。从这个角度看,跨国族群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在跨界而居各国均为少数民族,他们一般分布在相关国家的边境地区、国家之间的交界地带,在国家生活中一般以边缘人特征呈现;第二种是在其中一个国家不是少数民族(一般是该国主体民族),而在其他国家是少数民族;第三种是在跨界而居的两个主要国家不是少数民族,同时也由一些分布在其他国家而成为少数民族;第五,从跨境民族跨境而居的历史形成角度做的总结归类,黄惠焜先生‘对跨境民族做了三个层次的划分,一种属于回归型,一种是迁徙型,一种是流徙型’^②。

三、“跨界民族”的研究内容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的研究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界民族的基本情况的描述。金春子、王建民在《中国跨界民族》中介绍了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跨界民族的一些基本情况^③;马曼丽在《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中研究了中亚及其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及横贯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④;范宏贵在《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中介绍了越南的民族以及民族政策,中越、越老、越柬的跨界民族及民族问题^⑤;周建新在《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中介绍了越南

老挝两国的民族概貌,对中越中老跨国民族进行了识别和划分,对国家关系影响下的跨国民族族群关系进行了论述,并认为中越、中老跨国民族是一种和平跨居的模式,其跨国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各自的特点^⑥。学术界对跨界民族的研究从宽泛的跨界民族的描述具体到个别国家的跨界民族研究。

第二,跨界民族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探讨。对概念的研究和探讨是学术界的最为基础的工作。学者通过不同的视角对概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姜永兴《我国南方的跨境民族研究》(1988),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1988),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1994),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1994),赵廷光主编《云南跨境民族研究》(1998),葛公尚《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1999),朱伦《“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1999),杨勉《“跨界民族”改“跨界人民”仍会造成新的歧义——与朱伦先生商榷》(2000),马曼丽《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2002),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2002),周建新《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2002),马曼丽《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迁研究》(2003),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2004),曹兴《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2004),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述》(2005),周建新《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2008),张兴堂《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2009),金炳镐《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2010)等。

第三,跨界民族的历史研究。范宏贵《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的古今关系》(1982),刘稚《云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的源和流》(1989),邓雪琴《西双版纳跨界民族的历史变迁与发展构想》(1989),严英俊《略论广西同越南跨界民族壮、岱、侬的形成及其关系》(1996),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2001),刘海清《从历史角度看中越跨界民族与国家安全问题》(2006)等。

第四,跨界民族的语言研究。通过语言研究,来探讨跨界民族的历史、文化及认同。其代表著作有,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1993),熊玉有《谈谈我国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1999),韦树关《越南中越跨境壮侬语族语言的变异》(1999)等。

第五,跨界民族的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申旭《论云南

①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②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第75-78页。

③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

④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

⑤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⑥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跨境民族文化研究》(1989),张胜冰《滇文化与跨境民族文化》(1994),张有隽《边境上的族群:中越边民群体的人类学考察》(1999),张有隽《中越边境边民的族群结构》(1999),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2000),马曼丽《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2003),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2004),张兆和《广西京族跨国身份认同:试谈中国边界跨境民族研究》(2006),刀洁、和少英《守望国境线上的家园——金平傣族的社会文化》(2007),周建新《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2008)等。

第六,跨界民族的边贸经济研究。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跨界民族的边贸经济问题,代表著作有:刘稚《论跨境民族与云南的对外开放》(1992),邓雪琴、张琴《关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政策》(1995),侯峰《云南跨境民族边贸》(1996),李绍明《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的改革开放问题》(2000),方芸《云南跨界民族与可持续发展》(2001)等。

第七,跨界民族的地缘政治研究。学者从政治学、国家关系学等视角去研究,主要的代表著作有:范宏贵《日益严重的越南民族问题》(1981),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1999),金炳镐《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2010)等等。赵廷光《关于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的综合研究》(1993),刘稚《云南与周边民族国家和民族问题的相互关系》(1997),曹兴《跨界民族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1999),周建新《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

(2002),闫文虎《跨界民族问题与中国的和平环境》(2005),何跃《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问题》(2006),葛公尚《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2006),张兴堂《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2009),栾爱峰《地缘政治视角下我国西北跨界民族问题研究》(2010)等。

四、结 语

本文从跨界民族研究的几个基词(key words)出发,为跨界民族整个研究成功提供可能性。本文先从跨界民族的概念入手,不同学者有各异的界定,发现不同概念表达了不同学者是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的界定,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表述,虽然是相近的研究领域,实质上是对于不同的研究范围进行研究。跨界民族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理所当然的是跨界民族就有了不同的分类和研究内容。从对跨界民族整个学术史的回顾中,不难发现,对于跨界民族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从“大”的面和很多的点出发,而与人类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从“小”的点(村落社会)出发去反映“大”(社会文化)则不同。所以,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去研究跨界民族,从“小地方”入手,在田野中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对其方方面面进行研究,把整个“大社会”的拼图展现出来,才能较为妥当处理整个跨界民族的研究。

[审稿、责编:郭正涛]